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向”问题通信（一）

张晓林同志来信：

昨日收到您的信和寄来的《图书馆学通讯》，十分感谢。

武汉会议时，能和众多图书馆学、情报学工作者探讨有关问题，作为这条战线上的“一名新兵”，深感受益不浅，也感谢您和编辑部为我提供了这一机会。会后，本想对一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整理，但因我和另外一位同志承担的“成都地区十一所高校图书馆西文期刊计算机联合目录与管理系统”的程序编制任务正进入最后调试和实地实验阶段，我所承担的课程中学生社会调查论文也到了最后交卷时期，得花较多时间与学生们讨论他们的论文，弄得比较紧张，同时，因秋季学期要为新年级学生开设《情报学概论》课程，这是一门新课，事先也没有专门备课时间，故只好集中精力先突击备课。现在，备课和其他任务已基本完成，我正在阅读其他同志的有关文章，使自己对该学科及

其发展有更全面和更清楚的了解，以便在此基础上，再将自己的一些考虑加以总结和整理，看看是否能够成文。届时定将及早告您。

关于“造成一种能相互理解的人际关系和舒畅的探索环境”，我有十分强烈的同感。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认识是：

1. 真理往往存在于不同学派之中，真理的发展依赖于不同学派的共同贡献；真理的发展过程，就是各个不同学派不断相互争鸣的过程。因此，我们也许不应该期待有一个学派或一种理论能全面地回答所有问题，也不应该期待可以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论去完全取代过去存在的某种“有问题”的理论。不同学派手中都可能掌握部份真理，要意识到这一点，承认这一点，并在争论中尊重和吸收各学派所掌握那部份的真理，而不是完全抛开某一学派。即使认为某一种观点是错误的，也应该让它有机会与正确的观点相争论、相比较。当然，实际做起来时并不是很

研究指导。

5. 对一定成就的当代图书馆学家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包括他们在图书馆学思想史上的地位、贡献；他们的经历思想发展与专业发生发展的关系；他们的治学方法、特点以及可供学习借鉴之处。

以上1、2两点，近年来国内已有同志在进行工作，可惜没有组织，因而很难称得上系统、全面，使人有“见头不见尾”之感；第4点略有涉及，可惜对于研究全貌犹如画像一般描述，如某年发表了多少文章，某一课题占其中比例如何等等，而没有进入进展评价的更深层次；如比上年有了哪些实

质性的进步，取得了哪些公认的研究成果，其价值何在？对于发展方向的研究则更为薄弱。第3点和第5点则几乎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空白，笔者翻阅众多图书馆学学术杂志，未见发表健在的有成就的图书馆学文献目录学家的生平和学术论著。《图书馆学通讯》最近发表的《书海五十年——记上海图书馆顾廷龙馆长》颇为难得。有几篇论及已故图书馆学家的文章，也多是对其生平事迹的回忆，而对学术贡献则不过寥寥数语，这是图书馆学理论建设者亟须花大气力探索和开发的领域。

（冰丘来稿摘登）

容易，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时候都忘记了这些。

2. 爭論和冲突是自然现象，并不一定是坏事。避免冲突，往往就是避免发展，我们应该在心理上有一种对冲突的接受感和承受力。我国学术界（包括文艺界）长期以来对爭論和冲突往往有一种忌讳和畏惧心理，这当然与过去习惯于将学术爭論政治化的倾向十分有关，它所造成的严重不良影响之一是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认为爭論和冲突总是不好的，甚至在与政治相去甚远的领域也如此。我认为这种心理状态不利于科学发展，我们应该承认爭論和冲突存在的必然性，提倡并鼓励人们对各种观点、学派进行评价、比较和批评，善于利用爭論和冲突来发展科学。

3. 充分保证爭論双方对等原则，对此周义澄等人在《学术论战应当遵守对等原则》一文（载《解放日报》85年3月20日）中曾有较充分的论述。

4. 应当加强人们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提供相互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使人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彼此的观点、意见及其立论基础，这样才能更准确、更科学地进行爭論，以推动理论建设和发展。另外，“要造成良好的探索环境”，还应把学术问题和有关伦理、“关系学”、个人品质特性和人格等问题适当地加以区别，不要让学术爭論中卷入不必要或不恰当的感情色彩。我们许多同志（有时我也这样）在写文章时或看文章时总是不仅让自己的学术观点与别人的学术观点进行爭論，而且让自己关于个人尊严、个人地位、个人失败感和胜利感等夹杂其中，结果往往本来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爭論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演化成个人的冲突。所以，提倡不要把“我”卷入学术爭論，并提倡和鼓励在正常的学术爭論上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学术诤友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我国学术界，目前做到这点还不习惯或很困难，但却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上述看法还很不成熟，可解有较多错误，还望您多赐教。

本刊编辑部关于“方向”问题的讨论复读者作者

来稿经研读，对你于我刊“学术论评”栏发表的“方向”及“进展”两文花了许多时间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异议的理论兴趣深感敬佩。但“图书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问题伴随着图书馆的发生、发展而存在于中外图书馆理论界。人们在不断提出，不断探索。尽管我刊发表的这些文章未必系统，未必成熟或不够科学，但这些文章发表后确实引起人们的思考和理论兴趣；引起众多的人

致力于理论探索包括《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编写者、教学双方和众多读者的审视意识，这不能不算开展这一讨论所收到的社会效果之一。当然我们也充分地估计到开展这一讨论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但也为播下了这些火种而欣慰。当前我刊的任务是要造成一种相互理解的人际关系和舒畅的探索环境，以利于有志于此者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论战。